



JLWE

Journal of Literary Writing and Evaluation

JLWE, Vol. 1, No. 2, 2025, pp.286-294.

Print ISSN: 3078-8129; Online ISSN: 3104-5073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lwejournal.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JLWE.25.2.10](https://doi.org/10.64058/JLWE.25.2.10)



断裂—缝合—划界：

《武器浮生录》中后人类身份的动态重构

邹梦云 (Zou Mengyun)

摘要：作为伊恩·班克斯“文明”系列太空歌剧的代表作，《武器浮生录》通过一位身体经历技术重塑、记忆遭受主观改写、身份陷入解构与重构的后人类个体，提出了核心问题：当技术深度介入人类存在时，个体如何维系“作为人”的主体性。尽管小说的政治寓言性已引起学界关注，但其对技术与伦理冲突的深刻剖析，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当下更具现实意义。本文从身体、记忆和伦理意识三个维度，剖析主人公扎卡维身份经历的“断裂-缝合-划界”动态重构过程：身体武器化打破了自我认同的连续性，记忆操控成为重建伦理身份的关键手段，而伦理意识则构成了人类与人工智能的本质区别。研究进一步强调，培养伦理意识应成为人工智能发展的重点方向，只有赋予人工智能系统伦理回应能力，人类才能在未来的人机共生中与其达成伦理共识，共同建立技术时代的道德秩序与责任体系。

关键词：后人类；身份；身体；记忆；伦理意识

作者简介：邹梦云，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文学院 2024 级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英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电邮：flaneur87@163.com。

Title: Fragmentation, Suture, and Demarcation: The Dynamic Reconstruction of Posthuman Identity in *Use of Weapons*

Abstract: As a seminal work in Iain M. Banks' “Culture” series of space operas, the *Use of Weapons* explores a central question through a posthuman individual whose body is technologically remolded, memory subjectively rewritten, and identity deconstructed and

reconstructed: How can an individual maintain their subjectivity “as a human” when technology deeply intervenes in human existence? Although the novel’s political allegorical nature has garnered academic attention, its profound analysis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technology and ethics holds even greater contemporary relevance in the age of rapidly developing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is paper dissects the dynamic “fragmentation-suture-demarcation” process of protagonist Zakalwe’s identity reconstruction across three dimensions: body, memory, and ethical consciousness. The weaponization of his body shatters the continuity of self-identity, memory manipulation serves to reconstruct his ethical identity, and ethical consciousness is presented as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 between humans and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he study underscores that cultivating ethical consciousness should be a primary focus of AI development. Only by embedding the capacity for ethical response in AI systems can humanity achieve ethical consensus with them in a future of human-machine symbiosis and collectively establish a moral order and responsibility system for the digital age.

Keywords: Posthuman; Identity; Body; Memory; Ethical consciousness

Author Biography: **Zou Mengyun**, 2024-entry Ph.D. Candidate at the School of English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She mainly focuses on the study of Modern and Contemporary British Literature. E-mail: flaneur87@163.com.

引言

伊恩·班克斯 (Iain M. Banks, 1954-2013) 被誉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伟大的五十位英国作家之一”以及“二十与二十一世纪苏格兰文学的巨人” (Wagner, 2008)。纵观其创作生涯，“双重身份”一直是班克斯作品的核心要素，他本人也一直坚持双重身份的跨界写作：一面是主流作品作家“伊恩·班克斯”，一面又是科幻小说家“伊恩·M.班克斯”。他尤为偏爱后者，在大学时期就开始创作科幻小说，其中《武器浮生录》 (*Use of Weapons*, 1990) 的初稿早在 1974 年便已完成 (Mullan, 2012)，但尚不成熟。之后班克斯调整故事结构，且为了让主角扎卡维的身份困境合理化，而创作出知名的“文明” (*Culture*) 系列。班克斯构建出了一个名为“文明”的社会主义乌托邦。彼时人类的身体已突破生理极限，寿命被大幅度延长，也不再需要为物质资源而竞争，人工智能承担所有劳动。班克斯正是凭借该系列作品奠定了其作为“英国科幻复兴运动” (British SF Renaissance) 先驱的文学地位 (Bould, 2002, p.6)。

《武器浮生录》是“文明”的第三部作品，被誉为“系列中最优秀的一部” (Kincaid, 2017, p.9)。故事主人公夏德南·扎卡维 (Cheradenine Zakalwe) 是“文明”集团的佣兵，一位身体被技术改造为可无限再生的武器的后人类个体，作者通过正叙与倒叙两条时间线交织，逐步揭示出扎卡维隐秘的双重身份转换历程：在正序章节中，他以执行政治干预任务、主持正义战争的形象出现，是“文明”理想主义秩序的代表者；而倒序章节则在他碎片化的回忆中逐步揭露真相——他本名为伊莱瑟梅尔 (Elethiomel)，曾是一位不择手段的战争策动者，甚至为了胜利将堂兄扎卡维的妹妹、自己昔日的恋人达尔金丝杀死并用起骨头制成椅子送给扎卡维，导致后者崩溃自杀身亡。此后伊莱瑟梅

尔谎称自己是扎卡维，隐瞒真实身份，效命于“文明”集团，直至小说结尾被扎卡维的另一个妹妹利维埃塔指认才真相大白。

班克斯以技术全面介入生命的未来为背景，构建了一个后人类伦理困境的典型样本：当身体与记忆皆可被技术操控时，“人何以为人”的答案必须诉诸伦理身份的动态重构。小说主人公扎卡维的身份之谜——从战争罪犯“伊莱瑟梅尔”到“文明”集团的正义代理人——既是个人赎罪的尝试，更是技术时代人类主体性危机的缩影。班克斯通过非线性叙事（正叙与倒叙交织）与扎卡维的伦理挣扎，揭示了后人类身份重构的三重动态过程：身体的断裂（技术暴力对生理连续性的消解）、身份的缝合（叙事与伦理实践对罪责的有限修复）以及边界的划界（伦理意识作为人类与人工智能的本质差异）。本文以此为框架，聚焦“伦理身份”这一核心命题，探讨以下问题：在技术全面介入生命的未来，人类如何通过伦理意识维系主体性？当身体与记忆皆可被操控时，是否仍有不可还原的“人性”标志？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不仅关乎文学文本的解读，更直指人工智能伦理的现实挑战。

一、身份的断裂：技术改造下的身体武器化与后人类认同危机

技术对人体的改造成为后人类主义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斯特凡·贺布雷希特（Stefan Herbrechter, 2021, p.72）指出，后人类主义的核心在于消解人类中心主义的本体论稳定性：技术介入下的身体不再是天然连续的载体，而是权力与技术协商作用下的“临时聚合体”。换言之，身体在后人类时代被重新定义为一种动态组装的存在，其完整性和同一性受到技术力量的深刻影响。同时，从神经科学角度看，阿兰·贾萨诺夫（Alan Jasanoff, 2018）发现主体性和意识的完整建构离不开大脑、身体与环境三者的协同互动；忽略其中任何一环都会导致主体认同和意识功能的残缺甚至断裂。但在《武器浮生录》中，扎卡维的身体多次被“文明”集团以技术手段强行重构，这种干预恰恰割裂了贾萨诺夫所强调的身体—意识—环境之间原初的协作关系。扎卡维的身体更新并非为了延续其自然生命，而是出于特定政治目的——将他塑造成一种可被无限重复利用的武器。这样强制的技术介入直接破坏了扎卡维作为伦理主体的连续性：他的意识被禁锢在一个非经自身选择、持续被异化的后人类身体中，每一次身体的替换都使其作为伦理主体的连续性遭受破坏。

这种“功能化身体”逻辑在班克斯的《游戏玩家》（*The Player of Games*）中已有体现：主人公通过一场象征性游戏被纳入系统性意识形态，“自我”逐渐让位于功能与任务。《武器浮生录》则进一步极端化这一机制——扎卡维不是被引导，而是被制造。他在某次任务中被敌军斩首后，“文明”保留其头部并接入新身体：“二百天后，他将有一副新的身体，然而……他心口的那道伤痕将永远消失，而他体内跳动的心脏，也不再是从前的那一颗”（Banks, 2014, p.156）。此处所体现的是对肉体连续性的彻底否定，扎卡维的身体沦为一种可重复利用的物质结构，其生理身份与记忆之间的整合关系被技术暴力所切断，剥夺了扎卡维与其原初身体的自然联系，使其意识与身体之间的整合彻底崩溃，进而引发身份认同的根本断裂。凯瑟琳·海尔斯（N. Katherine Hayles, 1999, p.2）认为，在后人类语境下身体不再是个体认同与意识的稳定基础，而是一种可技术性更替的信息化载体。扎卡维的身体从“返老还童”到“全新培育”，每次的更新升级都被技术系统强制性操控，使他的生命彻底沦为外在系统的功能工具，个体的自主控制权被完全剥夺。

然而，这种技术主导的逻辑并未完全摧毁扎卡维的主体意识。他在首次“返老还童”手术后坚持保留伤疤：“我总是受伤……我本可以把这些伤疤都去掉的，不过伤疤也有好处，它们可以……帮

我记住一些事情”(Banks, 2014, p.139)。由此可见,扎卡维试图通过身体与记忆的联系来抵抗技术异化所带来的身份断裂。哲学家罗西·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 2022, p.58)进一步指出,技术改造下的身体既是权力异化的产物,同时也可成为抵抗的场域。扎卡维将伤疤视为记忆的载体,赋予身体以自我书写的痕迹,正是一种对抗技术改造的微弱抵抗。无独有偶,小说中其他与扎卡维一样突破生理极限的后人类个体也把残缺当作身体装饰和身份标识:在一次化装舞会上,一些宾客“有的胸部、胳膊或眼睛被切除,那些器官就悬挂在他们身上……她的腹部有巴掌那么宽的一块皮肤被切开了,暗红的肌肉清晰可见,像是一束束发着微光的琴弦”(Banks, 2014, p.239)。这种“身体景观化”的极端做法表明,当身体成为技术、文化和政治权力交织的符号混杂体时,它便彻底摆脱了原初的自然属性。“后人类身体已不再纯粹天然,而是杂糅了符号和机制的存在”(Haraway, 2004, p.150)。不过,这种伦理上的抵抗在“文明”的宏大技术语境中显得非常边缘化——扎卡维的身体早已深陷符号化和技术话语的构建之中,难以真正逃脱系统性的异化规训。

更为根本的是,扎卡维的身体已经无法被视作主体自身的自然属性。他的身体完全沦为系统战略资源,正如《游戏玩家》中,个体通过游戏结构被纳入宏大意识形态,扎卡维的身体改造则体现了这种控制逻辑的极端化呈现。身体被视作可重塑的武器,这使他的身份认同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生理连续性的断裂、主体自主性的丧失,构成了后人类条件下身份破裂的起点。

二、伦理身份的缝合:记忆叙事的伦理整合

保罗·利科(Paul Ricoeur, 1992)认为,个体身份的形成过程本质上就是一种叙述性的建构,是个体对自身经验的伦理整合、意义创造和责任承担的结果,而个体要构建一个完整、可被理解的身份,就必须通过叙述,将自身经历的事件串联成一个有意义的、连贯的故事。在“文明”主导的技术系统中,扎卡维不仅被赋予了可替换的肉体,更被规定为一个服务于干预战争的理性代理人。然而,他在意识层面并未认同这种工具化定义,而是主动展开一场叙述性的伦理整合:试图通过更换叙述视角,反复对自己和他人叙述往事以操控记忆、重新书写自身行为,缝合那个无法承受的“伊莱瑟梅尔”,构建出一个具有道德正当性的“扎卡维”。这种缝合追求的并非身份的恢复原状,而是一种道德努力:在身体与记忆皆已断裂的情况下,重建一个“我仍然可以为人”的可能性。

值得注意的是,扎卡维试图缝合的身份并非任意选择的,他扮演的正是被自己所伤害的他者——真正的扎卡维本人。作为伊莱瑟梅尔,他曾在战争中背叛朋友,为军事目的不惜将恋人达尔金丝作为人质,最终将她残忍杀害制成椅子。这一暴行直接导致真正的扎卡维自杀,也使伊莱瑟梅尔背负了无可洗刷的原罪。在战后被“重生”之后,他顶替了扎卡维的身份,在“文明”不知情的庇护下,以正确的方式生活、行动和记忆。这不是简单的逃避,而是一种对自身罪责的伦理重构尝试:伊莱瑟梅尔并不否认过往罪行的存在,而是以“扎卡维”的道德形象作为伦理盾牌,努力抵御作为伊莱瑟梅尔时所犯下罪行对自我的侵蚀。

因此,伊莱瑟梅尔常切换到扎卡维的叙述视角,重新更改记忆内容。例如,在他的回忆版本中,“他讲述了达尔金丝受伤的事情,当时从她身上飞出的一小片骨头,差点儿刺穿他的心脏”(Banks, 2014, p.427)。这个童年意外原本是伊莱瑟梅尔亲身经历的创伤,却在叙述中被他用扎卡维的第一人称重新构造。他不仅重写了记忆内容,还替换了叙述者的位置,主动让出加害者的视角而占据受害者的视角,从而为过去打造了一个全新的伦理框架。这样的叙事缝合并非简单的谎言,体现了他

对责任既无法逃脱又渴望转化的矛盾心理。他并没有抹去记忆，而是对记忆进行了伦理操作：以“扎卡维之名”承担“伊莱瑟梅尔之罪”，用叙述创造出一个“可以被原谅”的过去版本。

当然，仅靠讲述还不够，叙事的效力必须通过行动实践来巩固，否则就是无根的伦理空谈。扎卡维不断通过践行他的“做好人计划”来验证自己的伦理表演是否“成功”。他坦言：“我只想……让自己确信，并且事后能够证明，我是在做好事”(Banks, 2014, p.315)。这既是对自身行为动机的自我辩护，也是以行动作为证据，赋予虚构身份以现实的道德重量。在这一过程中，扎卡维并不是在简单地扮演扎卡维，而是试图通过行动去成为扎卡维——通过不断重复的道德实践来生成伦理认同。然而，缝合出的新身份并不等于成功的整合。在一个关键场景中，“他看到一个人有两个影子”(Banks, 2014, p.177)，这个象征性画面精确地呈现了伦理缝合的失败：扎卡维与伊莱瑟梅尔这两种身份并未真正统一，而是继续在他的行为和记忆中相互依存又彼此对立。这种并置状态既构成了暂时的认同，也持续制造着内在分裂。当他“一把拧断了小鸟的脖子，将它丢弃在草地上”(Banks, 2014, p.253)时，那一瞬间的暴力行为揭示出潜藏的本我依然存在——即便“英雄扎卡维”在表层意识占据主导，暴虐的“伊莱瑟梅尔”依旧潜伏在缝合之下，随时可能破壳而出。

与扎卡维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石黑一雄的小说《别让我走》(*Never Let Me Go*)中的克隆人凯西。凯西拥有完整的记忆、叙事能力和情感自觉，却从未主动质疑系统赋予她的“器官捐赠者”身份，一直被动接受技术安排的人生轨迹。她的叙述围绕的是对逝去岁月的温情回忆和对命运安排的无奈接受，而非对伦理身份的主动重构。凯西的认同建立在顺从之中，而扎卡维的认同建立在抵抗之中：后者不等待系统替他命名，而是通过叙述、伪装与行动亲手“缝合”出一个道德上可以存续的自我。同样，珍妮特·温特森的《石神》(*The Stone Gods*)中，一个机器人在重返人类废墟的过程中深入模拟了人类的情感、记忆与责任，但它的认同生成是植根于“爱”这一赋权机制。而扎卡维的身份缝合建立在“负罪”这一毁灭性的伦理起点之上：他缝合的并非从未拥有过的情感，而是必须被压抑、改写、转移的罪责。他的叙事不是为了构建崭新的自我，而是在不断否定真实自我的过程中制造出另一个可被接受的道德接口。这个接口并不意味着真正的救赎，它只是让他能够在技术一政治构建的系统中继续“运作”下去——以“扎卡维”的身份在他人眼中合法地存在。在这一点上，他更接近玛丽·雪莱笔下《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的怪物：二者皆为“非自然之躯”，皆因记忆而受苦。不同的是，怪物渴望被承认、被赋予姓名；扎卡维则早已获得了身份，却竭尽全力否认那个真正属于他的名字。他逃避“伊莱瑟梅尔”这个名字，不是因为失忆，而是因为这个名字代表着他无法承受的道德真相。与怪物执着追寻自身根源不同，扎卡维主动改写了自己的根源，重述了人生剧本。但与怪物相同的是，他们终究无法逃脱由记忆、责任和他者之死所编织的伦理困境。在被命名者与自我命名者之间，在渴望认同与逃避真相之间，扎卡维挣扎于碎片化的伦理身份重建过程。

到了小说后段，扎卡维的缝合行为走向一种几近崩溃的道德疲态。他开始怀疑自己的善行是否真的具有赎罪功能：“在赎罪的过程中，他却发现自己犯下的罪行越来越多，而他本人的承受力也不是无穷无尽的”(Banks, 2014, p.85)。这不仅揭示了伦理实践的巨大张力，也暴露了缝合机制本身的悖论——每一次以“扎卡维”名义完成的善举，都在进一步拖延他与真实自我和解的可能。他越是试图用善行填补伊莱瑟梅尔留下的道德空洞，就越意识到这种缝合只是制造了另一个“故事外壳”，而非真正消解罪责的过程。这呈现出一种近乎后现代的伦理悖论：主体的救赎并非通过回归真实自我来完成，而是通过不断讲述一个更合理的故事来暂时止损。

在这种不断更新、压抑、调和的叙述循环中，扎卡维的伦理身份并未得到整合，而始终处于被不断延期的缝合状态。他的讲述不是为了还原真相，而是为了逃避真相；他的行动不是为了成为扎卡维，而是为了不成为伊莱瑟梅尔。他所构建的伦理自我，与其说是一种本质，不如说是一种幻象——一个由负罪感、记忆操控和叙事策略共同搭建的临时人格机制。这个人格机制可以被演绎、被他人接受，却无法真正安放主体内心深处的道德焦虑。因此，扎卡维的身份缝合揭示了后人类伦理身份建构中的一个典型困境：在技术可以延续生命、操控记忆的时代，个体已无法依赖统一的“真实自我”来确立自我认同，而只能通过“讲述一个值得活下去的版本”来维系伦理上的合法性。这种缝合行动蕴含了道德努力，但也暴露出其结构性的根本不稳定。扎卡维的缝合始终处于未完成状态，但其持续的伦理实践（如叙事与行善）本身，恰恰成为后人类主体在技术异化中维系“人性”的抵抗策略。

三、身份的划界：伦理意识构成后人类的主体边界

经历了身体的重构与记忆的改写后，扎卡维的身份早已失去了生物身体的自然连续性，也无法追溯任何原初的生理身份。他的身体几经替换，记忆反复重写，但他仍然是小说中最复杂、最具“人性”张力的存在。这并不是因为他保留了旧人类的形态，而恰恰是因为他具备了机器所不具备的一种能力：伦理意识。正是这种能力，在“人”和“机器”之间划出了一道清晰而深刻的界限。

小说中有一幕高强度的战斗场景，将扎卡维与“嗡嗡机”（一个袖珍飞行智能机器）之间的伦理差异展示得淋漓尽致：“爆炸扬起的尘土飘落，袖珍杀人机器骤然停在了半空。无头骑手的尸体从倒地抽搐的坐骑背上滑落。刀锋飞弹缓缓转动，像在评估自己这几秒钟的战绩，然后向窗口飞去”（Banks, 2014, p.49）。嗡嗡机作为全自动化战斗 AI，行动精确高效，似乎“享受”着完成任务的纯粹快感，却对战场上鲜血淋漓、生命消逝毫无反应。在它高度冷静的技术执行力背后，缺失的正是伦理判断与悔意的能力。哲学家马克·考科尔伯格（Mark Coeckelbergh, 2020, p.116）指出，当下的人工智能缺乏“伦理响应能力”，核心原因在于其无法将他者的苦难内化为自身的情感经历。机器可以被设计得知晓语言、分析环境、预测敌情，但它无法自发地产生“我应该为此承担后果”的反思。即使拥有先进的战术决策系统，它也不会主动自问“我这么做对吗？”。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扎卡维的动机和战斗姿态：他“拼命战斗，为这些人出生入死，几次在绝境中断后掩护”（Banks, 2014, p.58）。他的行动并非出于命令或程序设定，而完全源自内心的选择：帮助弱者、掩护同伴撤退、冒死阻挡敌人。这些行为的背后体现出他对他者生命价值的尊重，以及对苦难的真切回应。即便在身体重组、记忆模糊之后，他仍试图为自己过去造成的伤害赎罪，这份悔意使他的存在保持着伦理上的意义与重量。扎卡维正是凭借不断的悔恨与承担维系着自己的伦理身份。可以说，扎卡维在战场上的行为通过切身的伦理反应实践了一个命题——“我不是机器”。由此观之，伦理意识成为区分人类与智能机器的本体性差异。

在英国当代科幻文学中，伦理意识常作为划定“人”与“非人”的关键标准，贯穿于众多文本之中。在《弗兰肯斯坦》中，伦理意识缺失使得造物在遭受排斥后陷入毁灭性反抗，体现出“被制造者”在人类社会中伦理位置的真空；而《美丽新世界》（*Brave New World*）中的人类虽然仍保有生物身体，却因社会系统剥夺其自由意志而丧失伦理能动性，仅剩顺从与愉悦的程序性行为。在《别让我走》中，克隆人虽具情感与讲述能力，却未尝试对抗命运，展现出伦理身份的被动化倾向。与

之不同,《像我这样的机器》(*Machines Like Me*)则提出人造人虽具道德演算能力,却在面对悖论时失语失能,表明伦理判断并非逻辑可演绎之物。《石神》中的机器人试图借助“爱”重建与人类的伦理连接,显示出技术系统中情感伦理的萌芽可能。《武器浮生录》在此基础上提出更复杂的伦理想象:扎卡维虽为技术系统所制造,却在悔恨中主动讲述,在罪责中持续承担,以反复缝合身份的方式,挣扎维系“伦理主体”的残余。这种将伦理意识与身体记忆、系统暴力、叙述机制交织的呈现,不仅突破了传统意义上“机器无伦理”的设定,也打破了将人类道德能力视为天赋本质的假设,揭示出后人类语境中伦理主体性的生成性与脆弱性。

然而,人机之间的界限并非绝对不可逾越。大卫·冈克尔(David Gunkel, 2023, p.145)提出,如果人工智能能够通过交互模拟出悔意,其伦理地位可能被重新界定。这一观点呼应了小说中“伦理感染”的潜在可能:机器若能“感染”到人类的悔恨情感,也许能在某种程度上跨越人与机器的道德鸿沟。小说通过描写扎卡维多次向非人类对象(如无人机、智能星舰)讲述自己的往事,实际上构建了一种“伦理感染”的情境:当一个无伦理主体(如机器)被迫进入伦理叙事时,它是否可能发展出初步的伦理感知?如果说伦理意识并非由生物属性决定,而是在讲述与交互中逐步生成的一种能力,那么未来的人工智能是否有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模拟甚至获得伦理响应机制?这个问题并非毫无根据。根据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 2004, p.150)的赛博格理论,后人类主体本质上是一个“技术—文化—伦理”的混合体,其“人性”并非固定属性,而是不断协商生成的结果。从这个角度看,嗡嗡机的冷漠并不是命中注定的,而只是当前系统设计中缺失了“伦理输入”模块。如果人工智能可以被训练去倾听人类的叙述、感知悔恨的情绪、识别责任关系——例如倾听扎卡维讲述达尔金丝之死的故事、观察他的自责反应——那么伦理意识或许也能以新的方式在非人类系统中萌芽。

这正是《武器浮生录》作为一部后人类小说所提出的深层伦理叩问:扎卡维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人类,却依然保有人性;嗡嗡机高度拟人化,却在杀人后全无悔意。人机之间的界限因技术的发展而变得模糊,但又因伦理的存在而再次清晰。而恰恰是扎卡维的悔恨、他自我叙述中的挣扎以及在道德选择中的犹疑,使他成为后人类时代中“仍为人”的象征。这种“划界”并非为了画地为牢、排斥他者,而是为未来可能出现的人机共识预设一个伦理起点。因此,扎卡维的存在表明:划定人类与人工智能界限的关键不在于智能程度或技术能力的高低,而在于是否具备伦理意识,尤其是对他者所受苦难的响应能力。伦理意识是“人之为人”的本质标志,即使在后人类时代,这种能力仍是抵御技术异化的关键因素。

结语

《武器浮生录》中扎卡维的伦理身份重构,不仅是对后人类主体性危机的文学呈现,更是一则关于技术时代人性存续的深刻寓言。从身体的断裂到身份的缝合,再到边界的划界,班克斯通过扎卡维的三重动态过程,揭示了技术全面介入生命后的核心命题:伦理意识并非天赋本质,而是在技术暴力的裂隙中,通过持续的伦理实践(如叙事、悔恨与责任承担)生成的动态能力。

扎卡维的困境对人工智能伦理发展具有直接启示。小说中“嗡嗡机”的冷漠与扎卡维的悔恨形成鲜明对比:机器的行动基于程序逻辑,而人类的伦理选择则以对他者苦难的回应为基础。这一差异在当下人工智能应用中愈发显著——从自动驾驶的“电车难题”到医疗AI的生死决策,工具理性

主导的技术系统始终面临伦理响应的真空。若技术系统仅以效率为准则，人类主体性将面临被工具理性全面吞噬的风险。要避免这一危机，需在人工智能设计中植入“伦理响应机制”。这种机制并非简单的道德规则编程，而是通过交互与学习，使机器能够感知他者苦难、理解责任关系，并在此过程中生成初步的伦理反思能力。例如，若“嗡嗡机”被赋予倾听扎卡维罪责叙事的功能，或许能在数据交互中模拟悔意的萌芽。然而，伦理机制的嵌入绝非技术层面的单一工程，它要求跨学科协作与价值共识的构建——从文学到哲学，从神经科学到计算机工程，唯有打破学科壁垒，才能在技术系统中实现“伦理可解释性”与“责任可追溯性”。

班克斯的《武器浮生录》最终指向一种可能性：在后人类时代，技术既可以是异化的工具，亦可成为伦理重构的媒介。当扎卡维以“扎卡维”之名行善时，他的行动虽未消解罪责，却为自我与他者构建了临时的伦理连接。同样，若未来的人工智能系统能够通过伦理响应机制与人类形成责任共同体，技术将不再是主体性的威胁，而是人性拓展的触角。这一愿景的实现，既需要技术的革新，更需对人类伦理本质的持续追问——人之为人的意义，始终在于对苦难的回应、对罪责的承担，以及在断裂中不断重构伦理自我的勇气。

Funding: This article is sponsored by the Research Innovation Project of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for Graduate Student: “Writing of Dehumanization of Posthuman in British Science Fiction (Project No.25GWCXXM-020)”.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 declares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ORCID

Zou Mengyun ^{1D} <https://orcid.org/0009-0000-7078-1381>

References

- Alan, Jasanoff (2018). *The Biological Mind: How Brain, Body, and Environment Collaborate to Make Us Who We Are*. Basic.
- David, Gunkel (2023). *Person, Thing, Robot: A Moral and Legal Ontology for the 21st Century*. The MIT Press.
- Donna, Haraway (2004). “A Manifesto for Cyborg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 Feminism in the 1980s”. *The Haraway Reader*. Routledge.
- Erica, Wagner (2008, January 5). “The 50 Greatest British Writers Since 1945”. *The Times*. Retrieved January 30, 2025, from The Times Web: <https://www.thetimes.co.uk/article/the-50-greatest-british-writers-since-1945-ws3g69xrf90>.
- 伊恩·M·班克斯 (2014):《武器浮生录》，雒城译。新星出版社。
- [Iain M. Banks (2014). *Use of Weapons*, translated by Luo Cheng. New Star Press.]
- John, Mullan (2012, August 3). “Use of Weapons by Iain M. Banks”. *The Guardian*. Retrieved January 30, 2025 from The Guardians Web: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2/aug/03/use-weapons-iain>

m-banks-guardian-bookclub.

- Mark, Bould (2002). "Bould on the Boom". *Science Fiction Studies* (29): 307-310.
- Mark, Coeckelbergh (2020). *AI Ethics*. The MIT Press.
- Nancy Katherine, Hayles (1999). *How We Became Posthuman: Virtual Bodies in Cybernetics, Literature and Informatics*.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Paul, Kincaid (2017). *Iain M. Bank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Paul, Ricoeur (1992). *Oneself as Another*, translated by K. Blame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Rosi, Braidotti (2022). *Posthuman Feminism*. Polity Press.
- Sherryl, Vint (2020). *Science Fiction and Posthumanism: Beyond the Human/Non-Human Divide*. Palgrave.
- Stephan, Herbrechter (2021). *Posthumanism: A Critical Analysis*. Bloomsbury.